

# 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 论的理论硬核及其当代意蕴

——从理性主义的纬度透视

傅 耀

**摘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一直奉行理性主义传统,并把确定性经济社会观、经济人假定和个人主义作为其方法论的硬核;而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又不断地把逻辑演绎、数学方法和博弈论纳入它的方法体系中。在如何对待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中,以揭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演变为线索的路径可以让我们发现它的理论具有的特性。这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传统,而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要根据研究的实际问题实现多样化,包括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些具体研究方法。

**关键词：**西方主流经济学 方法论 理论硬核 理性主义

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由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历来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的两块重要基石,所以,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没有谁能动摇得了这一方法论基础。尽管如此,当涉及到如何对待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时,国内学者还是产生了分歧。一派坚持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处于主导地位的观点,而另一派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只能是我们用以参考、借鉴的对象,能够成为主导的仍然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到底如何看待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态势?本文试图从理性主义的纬度出发,透视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历程,并对其理论危机和谬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意蕴。

##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硬核

西方主流经济学共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三个阶段。不同时期的经济理论体现出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或者说不同的方法

论内核使得经济学理论区分为不同的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理性主义方法论作为主导,这既与理性主义思潮在西方有着深厚传统的原因有关,也与经济学产生于一个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背景分不开。“自从经济理论被系统化以来,它一直是以某种理性概念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一直运行于理性主义的轨道上。解剖理性主义方法论,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不变的内容构成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硬核”,这包括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经济人假定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源于从中世纪到18世纪的“自然法”观念。托马斯·阿奎那利用“自然法”的观念,为封建等级制辩护。在18世纪,首先是重农学派运用“自然秩序”的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重农学派是奉行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的典范,他们的目标在于通过改革税制和改善一个有效率的大规模的农业体制来重组法国经济。魁奈的思想体系涵盖社会及自然科学并以自然规律为基础,重农之意在于强调自然规律,这种思想反映了一种把这个世界看作一个由法律带来秩序的完整体系的静态观点。这正是莱布尼兹哲学的乐观主义所在,也是

法国理性主义者对从“自明”的前提中推出真理的推理能力的信任。魁奈对于世界与科学的观念与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修订过的笛卡尔理性主义方式是一致的。这些人工推理作品在柏拉图思想中及在当代经济学所运用的理论模型和抽象概念中都能够找到其对应物。作为笛卡儿主义的追随着,魁奈由此成为经济学中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重农学派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自然秩序”,即合乎理性的秩序。但他们没有把这种秩序看作是自然社会固有的客观规律,而是把这种自然秩序说成是由上帝制定的秩序。实际上,重农学派是想借“自然秩序”来说明资本主义是一种永恒的社会制度。重农学派的理论设定了一个神意的秩序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和谐的、永远不变而且有益的。他们是在理性之光中发现自明真理的理性主义者,他们不求助于经验。对于魁奈,是道德律要求坚持遵守自然秩序这一“自明显然是对人类最为有益的秩序”。这一秩序的正义性来自于它的效用,而它的永恒不变的特性即拥有个人自由与私有财产是自然权力。18世纪的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自然秩序”,从而也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自然的”和“永恒的”制度。而在亚当·斯密的时代,他有机会把这种经济社会的确定性观点深深地根植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土壤中,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种自明性前提。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经济人”假定是建立在理性标准下的一种对人的抽象,这个假定是从对人的本性的一种理解出发的。在18世纪的思想家中间,人类的“自爱”甚至人类的“自我利益”,多被他们描述为“普遍的动力”,而且他们又把这种“普遍的动力”说成是最符合理性的行为。亚当·斯密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秩序的性质,把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他认为每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支配,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共同利益。这种个人利益的追逐者就是“经济人”。为了满足这种“经济人”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人利益,要求实现“自由放任”。斯密认为,“自由放任”是人的利己本性的体现,是“自然秩序”规律性的要求。后来经过J. 穆勒、边沁、古诺和戈森等人对于边际效用的探讨,所有这一切构成“古典经济人”走向新古典经

济人的基础。杰文斯认为,经济学如果要成为科学,必然且必须是一种数学性质的科学,经济学是“效用和自利的力学。……以最小的努力使我们的需要得到最大的满足——以我们所厌恶的最小代价保证我们所希求的满足最大量,换言之,使快乐最大化,这就是经济学的课题。”杰文斯从个人及其需要出发,给市场规律提供一种数学的说明,实际上是为他的理论体系寻求根据。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以经济人的最大化动机为假设,把理论经济学的研究限定在资源最佳配置的领域之内,以边际原理论证经济人所应遵循的法则。他的这种观点代表着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看法。马歇尔也以“经济人理念”作为其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可见,经济学理性的第一个含义就是人的自利性假设。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出发点,这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的核心思想。在亚当·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自利性和社会性。因此,在古典经济学里原本没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对立。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但是,对于阿尔钦来说,人的社会性归根到底是基于人的自利性基础之上的。而人的自利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经济学理性的第二个含义是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加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等同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马歇尔看来,决定人类行为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力量是经济的和宗教的,这一看法已经被现代经济学遗忘了。萨缪尔森认为,宗教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可以通过效用函数的参数来反映,从而一切人类行为归根到底可以由极大化效用函数来解释。经济学理性的第三个含义就是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导致了“社会博弈”的现代看法。

个人主义既是“经济人”假定的基础,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石。杰米利·边沁的功利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非常大,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功利主义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导向个人主义。边沁认为,只有个人不但是最好的,而且是唯一地知道什么构成他幸福的人。因此,个人追求私利是正当的,不应受到任何干涉。这种伦理上的个人主义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赋予个人主义以新的意蕴。个人主义是以孤立的或自足

的个人存在为先决条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体系就是以对这种个人的分析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个人主义把经济系统看作是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组成,经济活动是人们行为的结果,而行为又受思想倾向的指导,因而个人心理倾向成为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经济活动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还原法为基础,通过对“理性经济人”的分析,奠定了古典经济学个人利己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最特殊的个人构成了必须经由最高层分解到最低层的分析起点,这是一种坏的习惯,因为这种研究忽视了制度的存在。个人主义方法论是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基本思想方法,它不仅体现在微观经济理论中,也体现在宏观经济理论中。不仅在微观经济学中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基本的分析方法,而且宏观经济学也是以个人为起点进行分析的。用个人的动机和选择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存在着两个根本缺陷:一是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并非以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一客观事实。二是无法解释不同个人动机产生的缘由,也无法说明不同个人所拥有的选择力量的成因。实际上人的理性、动机及其行为能力,都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活动环境所决定的。

理性主义的这三个“硬核”,尽管在当代受到许多诘难,但是舍此之外,目前似乎难以找到其他的基点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经济人假设既不完全符合事实,也绝非完全是虚构。因此必须从“工具”的角度考虑它的适用性。从工具的角度出发,经济人假设仍然是经济学的基础假设。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假设前提,不仅要考虑它的逼真度,还要考虑它的适用性。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演进的全过程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方法论的普遍运用。不过,在贯彻这一方法论的时候,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流派,演绎出丰富的具体研究方法。

##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历程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方法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具体的演进过程是从最早的证实的理性主义到批判的理性主义再到理性主义的重构。在这种理性主义的演进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具有阶段性特征的不同的具体研究方法。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早期,理性主义的方

法论采取的是实证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包含了两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即历史归纳法和抽象演绎法。历史归纳法是对经济学知识或理论进行事实归纳加以证实的方法。抽象演绎法是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演绎导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历史归纳法和抽象演绎法在斯密的《国富论》中是并列存在的。但是,斯密之后,特别是到了李嘉图,为把经济学建成像牛顿物理学一样更加“精确”的科学,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只局限于演绎方法。然而,李嘉图的抽象不是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抽象,再由抽象过渡到思维的具体,而是从纯粹假定的思维原则出发来演绎客观存在的具体,将高度抽象的理性模型直接运用于复杂的现实世界。李嘉图以后的许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进一步把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精细化,并运用到构建经济学体系的过程中。到20世纪30年代,罗宾斯重申和发展了主流经济学的演绎主义传统,使得演绎主义获得了它的现代标准范式。罗宾斯认为,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基于内省所得到的近于公理的假设中演绎出来的(科里,1992)。从少数几个自明性假定出发,通过逻辑演绎去发现不可抗拒的真理,是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抽象演绎在经过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的推崇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它在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中的地位。当然,在历史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那里,虽然有过复活历史归纳法的努力,但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倒是抽象演绎法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越来越完善的形式,即将理性数学化的倾向。斯密开辟的古典经济学把一只“无形之手”留给了后来的经济学家,而对这只“无形之手”的信念,推动着主流经济学家以数学工具证明有一个逻辑上一致的一般竞争均衡模型的存在。而且,为了证明这种一般竞争均衡模型的存在,对数学工具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化,以致于经济学家的数学知识越来越高深,达到令物理学家都艳羡的程度。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了理性主义从证实的理性主义向批判的理性主义转变。这一转变是借助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完成的。由波普提出的“证伪主义”,很快被英国经济学家托伦斯·哈奇森引入经济学领域。他认为,经济学与逻辑学和纯粹的数学不同,它是像所有其他自然科学一样的一种经验科学,因而应当采用相同的方法。因此,应根据可证伪性原则对经济学理论的每一点进行认

真的经验检验。这是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所必备的。哈奇森的观点在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引起了一个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大论战,产生了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工具主义首先强调假设是否现实并不重要,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一般来说,“理论越是有意义,假设也就越是不现实”。其次,他认为,从一定假设出发演绎的理论,其有效性决定于它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最后,他得出结论,只要事实证据能够表明预测正确,那么该理论的有效性就值得肯定;相反的,当事实证据说明预测是错误的,那么该理论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特别是他的假设不相关论点,引起的争论也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弗里德曼的论点还是被广泛接受。有人就把这种方法看作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他们认为,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参照系或基准点和分析工具。视角提供的是一些看问题的出发点,如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参照系是一种用来理解现实的标尺,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分析工具在上述的视角和参照系下,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数学的方法。因为缺乏现实性的假设,是数学运用的一个重要前提。

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的理性主义也相应地发展到了理性主义的重构阶段。在此阶段,作为工具的博弈论被经济学家们用来尝试重写正统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传统把“理性人”或“经济人”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把这种“经济人”作为抽象的人看待,从而舍象掉了具体的“经济人”之间发生的关系。现实中,人们之间相互影响,人们的行为不仅仅建立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上,而且还要考虑别人的理性行为,或者要受到其他人理性行为的影响。这些更为现实的情况,为博弈论提供了应用的舞台。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以博弈论重写微观经济学乃至经济学,结果在众多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博弈论大行其道。目前,博弈论已从多个方面对经济学产生了影响。首先,经济学越来越转向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直接研究。博弈论的引入为经济学研究这种个体

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种便利的手段。其次,经济学能够对处于“黑箱”的竞争过程和生产过程给予更深刻的揭示和更细致的描述,也离不开博弈论的运用。最后,博弈论引入经济学还加强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同时,也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开放的学科。

以上重点介绍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全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采用的方法更为丰富。除主流经济学之外的其他非主流经济学,不仅在理论上与主流经济学进行抗争,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探索出一些适应自己理论分析的方法。除了前面提到的历史学派所坚持的历史归纳法外,制度学派倡导的制度分析、规范分析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成果。

###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的理论危机和谬误

西方主流经济学到目前为止仍然坚持着新古典传统,其分析思路是基于对现实的线性认识。这是由于新古典传统是在斯密的归纳主义方法论路线的基础上,经过了马歇尔、托伦斯、哈奇森、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大家的进一步发展,使经济学变成了一个类似牛顿力学那样完整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但是,经济学理性的这三个含义各自都引出了严重的问题。自利性假设被看作是工具主义的假设,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后来的社会进化论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人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并且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过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类似生物界的竞争。但是现代经济学的自利性假设与古典经济学的自利性假设相去甚远。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而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他把自利性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就是著名的所谓“亚当·斯密问题”。其实,《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论述的主题是一致的,在对利己主义行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国富论》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但对于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sup>①</sup>在道德世界,同情心完成这种整合;在经济世界,私利完成这种整合。两个原则在其各自的领域都表现为创造出一种和谐来,正如牛顿的自然秩序一般。<sup>②</sup>但是,斯密对于人

性所持的双重态度在现代经济学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首先是理论演化的结果,对立假设之间的争论最终会把对立面推到极端。理论要求以最少的功力解释最多的现象。放弃人的利他性假设是经济学必须要走的一步。阿尔钦是最早提出“自利性”<sup>⑬</sup>作为假设的经济学家,但是他的假设是一种纯粹工具主义的假设。后来弗里德曼将其发展到极致,假设无关紧要,但一定要有预测力,这就是著名的“假设不相关论题”。围绕着这一论题,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和希尔博伯格展开了一场大争论。弗里德曼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不必受到现实检验,唯一需要符合现实的是理论能够导出对现实的预测。而希尔博伯格则认为,经济学基本假设应当受到现实检验。<sup>⑭</sup>后来罗纳德·科斯采用了后者的立场,阿尔钦的进化论论据则为这一立场提供了最有力的辩护。这样,从进化论的论据出发,经过上述重要的方法论转折,经济学理性主义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假设。所有这些命题都是从基本假设推导出来的,从而都是经济理论为真的必要条件。芝加哥学派的这一立场使得主流经济学当代文献中,除了数学模型之外,还充满着统计数字和模型检验过程。从斯密的自利性假设,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立场,这一转折造成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可能。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自利性”假设,其解释力的根源在于: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可是,一旦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不再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将失去解释能力。这一趋势在“后工业社会”里显得更加清楚。当物质生活富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去追求以放弃效率为导向的精神生活的富足。主流经济学走到今天,已经显示出其在处理日益复杂的现实经济问题时的无能为力。

首先,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在当代面临着严重的理论危机。其一,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将经济理论视为一种工具主义的约定,其认识论基础仅仅要求理论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这种认识论立场包含着深刻的经验主义意识。这种经验主义坚持认为,人类理性顶多只能从统计方法来预测未来,至于统计关系后面隐藏的构造关系,是永远无法确切地认知的。当预测现实成为对理论有效性的唯一要求时,理论假设可以完全脱离现实,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做

出非常强的理论假设,只要它有预测能力。其二,在多层次社会文化的演进过程中,竞争未必成为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时经济学理性主义的进化论论据便发生了动摇。其三,随着社会博弈论进入主流经济学,纳什提出经济学家惯常使用的“效用函数”及其理论需要更正,并提出用“选择算子”(Choice Operators)是对经济学效用理论加以改造的最富有现代意义的理论工具。<sup>⑮</sup>

其次,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存在着严重的方法论谬误。具体表现为:第一,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各个部分是不可迭加的。经济主体不可能把单个现象从其所处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因此局部均衡分析和局部最优化行为是难以解决问题的。第二,经济系统是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统一,时空是处于变化中的,变化是常态,相对静止只是一种短暂的极端现象。因此,均衡分析和静态均衡分析是难以把握动态系统的本质的。第三,在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中,时间与空间统一在一起,一旦不同事件或不同的行为者在时间轨迹上出现交错或滞后反应,也会大大地影响到整个动态过程,导致均衡不能实现。第四,在经济系统中,各个经济主体无论在知识能力、掌握信息的能力,还是在理性程度和行为能力上,都是异质的,而代表性行为者却是对于经济系统分析的主要方法,显然基于这种微观基础分析的宏观经济学存在严重的偏差。第五,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经济人,而理性是有限的,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演绎方法在使用过程中就大打折扣。<sup>⑯</sup>

#### 四、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现代意蕴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理性主义方法论为基石建立起来的研究方法体系,尽管存在着明显的谬误和理论危机,但它仍然支撑并推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这应该引起我们两方面的思考,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理论;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分。

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立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正像西方主流经济学尽管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但其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始终没有发生改变。理性主义有实证的理性主义、批判的理性主义和泛化的理性主义之分。<sup>⑰</sup>随着理性主义形式的

改变,理性主义的内核逐渐被放置在理论的最深层次上,并最终决定着经济学理论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也可以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探索能够表现唯物史观的不同阶段的形式。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随着社会发展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各种形式,这决定了我们在贯彻唯物史观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存在的形式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因此具有了新的天地。

第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演进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启示还在于其具体研究方法的精确化取向上。从以上我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演进的归纳和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许多具体研究方法就是为了把所研究的经济现象更精确化。这一点集中在数学方法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运用上,确实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从而使其应用的普遍性和复杂程度有所提升。而这一点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时着重的是规范分析,但是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指导理论时,仅仅规范分析已经显得不够了。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行实证的要求越来越突出。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精确化,这也是马克思本人所极力倡导的。

第三,博弈分析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占有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这种趋势代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独立的个人研究转向重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互动关系,而且这种转向标志着对人类社会的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历史。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自发秩序的拓展。人类智慧正是在这种自发秩序的拓展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这其中孕育的博弈规则是理论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把博弈分析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可以作为博弈分析的基础。我们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体系的革新,就必须考虑到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可以借鉴的具体研究方法,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体系的更大的适应性。

第四,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演进还有一点值得我们重视,即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演进,抽象的程度不断加深,以至于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可以是虚构的。他们竟然以一种虚假的假定演绎经济现象的发展逻辑。而数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中的运用已经步入困境。因此,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要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向精确化方向发展,也要警惕西方主流经济学走过的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重现。同时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分野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二者存在相互结合的社会基础、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 注释:

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经济研究》,2005(10)。

阿罗:《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说》,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2卷,73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⑫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中文版,160~161、19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Jeavons,Stanley,1965.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Kelley and Millman,p.35.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上卷,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Samuelson,P.,1947.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sup>nd</sup> ed.,1982.

傅耀:《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21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劳伦斯·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29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颜鹏飞、傅耀:《经济学方法论动力学刍议》,载《学术月刊》,2001(4)。

⑬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文版,译者序言,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⑭Alchian,A.,1950. "Uncertainty,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58,pp.211-221.

⑮转引自汪丁丁:《直面现象:经济学家的实然世界》,26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

⑯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载《社会学研究》,1998(1)。

⑰文建东:《论主流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传统》,载《江汉论坛》,2006(4)。

⑱程恩富、胡乐明主编:《经济学方法论》,324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系 广州 510521)  
(责任编辑:K)